

别哭，这是战争……

《中国兄弟连》姊妹篇

# 生死兄弟

1949★渡江战役



杨昭仁★著

万舟齐发·雄师百万满江红★热血一腔·深情终成千古恨

**BROTHER OF LIFE AND DEATH**



华龄出版社



# 生死兄弟

1949★渡江战役

杨昭仁 著



華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兄弟 / 杨昭仁. 著—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5

ISBN 7-80178-300·X

I. 生... II. 杨...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124 号

---

## 生死兄弟——1949·渡江战役

---

作者: 杨昭仁 著

策划: 北京旅之友图书中心

责任编辑: 佟景宸 李惠玲 闫丽

装帧设计: 王旭 刘彬

封面摄影: 邹健东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

字数: 260千字

定价: 25.00元

书号: ISBN 7-80178-300·X/I·42

---

地址: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电话: 84044445 (发行部)

邮编: 100009  
传真: 84039173

## 序

---

1949年2月5日，毛泽东电令第四野战军，组织先遣兵团，先行南下华中，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逼近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不敢向南京增援，配合二野、三野夺取南京的任务。四野先遣兵团由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四十军、四十三军23日从天津出发。而在整个渡江战役的东段、中段、西段，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我第二、三野战军却经过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数以万计的战士的伤亡代价，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句是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浪漫表现手法，或是作为领袖从历史的宏观高度的概括。作为身在作战前线的指战员们，面对的却是宽阔、水情复杂的滔滔长江，以及对岸国民党军坚固密集的地堡群，形成的交叉火力网、多层次的铁丝网、地雷区，还有江面上的敌方军舰和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敌方战机的立体防线。我们的战士是乘坐木制的帆船去拼杀，战士们把自己仅有的东西和遗书交给炊事班长，抱定自我牺牲的精神与敌人拼死一搏。

渡江战役胜利了，百万雄师过了大江，解放战争中直捣蒋家王朝首都南京的惊心动魄的战役以我军全面胜利而告终。而在这场血染江水的战役中，交织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包括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我地下党的斗智斗勇，我高层指挥员的战役决策，国共两党的最后谈判，还有百万群众的支前工作。如今，这辉煌的一页已被历史无形地翻过去了，留给后人的恐怕最多也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的历史记录。

2

作为当年和百万雄师同时面对滔滔江水的普通一兵，围绕着渡江发生的耳闻目睹的人与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56年后的今天，终于将其化作文字，奉献给读者，更准确地说，是奉献给历史，奉献给那一段“水深火热”的历史。

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遇见在敌营工作15年的徐远一同志。那是在1956年8月，宣传部长徐韵从军里调到北京工作，我去看望这位老首长。徐部长把我让进客厅后，看到一位50多岁的军人坐在沙发上，徐部长还没有给我们介绍，那位军人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见过面。”

“是的。”我也想起来了：“是在1952年的广州东山招待所，您是徐远一同志。”他拍拍我的手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还记得我。”

“您有特殊‘标志’，在当时介绍您时，说您是国民党，我还以为您是起义的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哪知道您是打入凤尾滩要塞的地下党！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在敌营工作的同志，所以记得很牢。”

徐韵对我说：“你和徐处长早就认识了？”

“是的。徐处长，您能抽出点时间，把您在凤尾滩要塞的工作情况给我说说吗？”

徐处长说：“我记得你在1952年就问过我，我粗略地和你谈了谈。当时我是路过广州，时间短，也是我刚回来还在兴奋当中，

心也塌实不下来。渡江战役有很多英雄事迹，都是很生动的。我知道的唐建中和唐建华兄弟两个，一个是渡江突击连连长，一个是打入敌营工作的地下党党员，他们的事迹是很曲折很生动。我最近写了一个回忆录你先看看，然后咱们再谈。”

“太好啦！”我问：“在北京的还有要塞地下党的人吗？”

他摇头说：“在北京的没有了。当时的交通员仲琪在上海，炮兵总台长王景德带着炮兵团入朝，在朝鲜牺牲了。其他的人没有联系，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徐远一给了我一份他写的回忆录，不到四千字的回忆录我看了有十遍，用红笔在上面点画了多处。第一感觉是徐远一同志“怕”，怕在回忆录里表现自己有抢“功”之嫌；怕敌我不分，立场不鲜明，有辱共产党员声誉，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谈出我所需要的“素材”。我根据他的回忆录，提出若干问题，请他一个一个地解答。我和徐远一同志几乎谈了一个上午，有的问题他说得很含糊，在我追问之下，他笑了，说：“你就按着我说的编吧。”

我也笑了：“编不出来呀，编出来的总是有编造的痕迹。”

“得啦，让我想想，咱们明天再说，好不好？”

第二天中午，徐远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交通员仲琪从上海来了，他问我需要不需要见他，他今天晚上去沈阳。我放下电话就往他家里奔，到他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

仲琪是60几岁的老人了，瘦小的个子，满口的苏北腔调，他热情地和我握着手说：“徐远一都和你谈了，我没有可谈的。”

我们坐下后问他：“您当时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我看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说了句摸棱两可的话：“算什么都行，反正我是为党工作的。”我想可能是当着徐远一不好谈，我说：“徐处长，你给我们找个地方，我和仲琪同志好好谈谈，你就别陪着我们了。”

徐远一理解我的意思：“你们就在这儿谈，我到门诊部去量

量血压。”他走后，仲琪说：“我是一个地下党的领导人，传达上级指示、向江北组织汇报都是我。党组织专门给我配备一部电台，这部电台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们，万一出事怎么办？”他为了让我相信，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张图，图的内容是凤尾滩要塞的环境、电台的位置，意思是要说明他的重要性。

我问他：“您用什么方法传达上级指示？”

“看情况，有时我召集他们开会面谈，有时是密写的信。”他习惯地、用他多年养成的那种警惕性，向四外看了看，凑到我的耳边说：“用白矾水写在纸上，他们看时，把密信放在一盆水里，字就显现出来了。”

4

其实，他对凤尾滩要塞的情况并不了解，对要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也不清楚。1946年，唐建华打入国防部三厅（作战厅）后，先后取得了蒋介石亲批的华东、华北、东北主要战场的作战计划，是经过两个人传递出来的，最后是仲琪交给了林宇部长。关键的关键是从敌人内部拿出作战计划。仲琪同志长期的、反复的、十分危险地屡次深入敌营，传送情报和党的指示，但他承担的是单项任务。

徐远一和我连续谈了两个上午，回答我所提的问题。当我写出提纲后再去找他时，他已经被划为“右派”离开北京了，听说他要求到渡江烈士陵园守墓。我没有条件去找他，他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却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

进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打成“特务”、“叛徒”，经过七斗八斗，被“群众”专了政。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他落实了政策，平了反，改正了错划的“右派”。1977年，他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我去看他时，他消瘦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没有精力和我说话，记忆力也衰退了。在病房里，除了他爱人外还有一男一女在小沙发上坐着，徐远一介绍说：“这就是我和你说的，兄弟两个一个是渡江突击连连长，一个是打入敌

营工作的地下党党员，他就是渡江时的突击连连长，是打入凤尾滩要塞的唐建华的哥哥唐建中。”

“哎哟，难得和您见面哪！”我握着唐建中的手问：“您住在那里？”

“我在济南，我爱人蓝芝回家去看她母亲，顺路来看看徐远一同志。我们有20多年没见了，那还是我和蓝芝结婚时，他参加我们婚礼时见的面。”

徐远一对我说：“蓝芝是送突击连渡江的船工，他们是在战火中谈的恋爱。让他给你介绍介绍，比我给你说的精彩。”

唐建中憨笑着说：“没啥精彩的，就是打仗呗。”

唐建中给我介绍了他弟弟唐建华是怎么打入敌营的；在渡江战役中，唐建中是前卫团突击连连长，他11年没见他弟弟，只在唐建华秘密过江送情报时，他和弟弟见了一面；他的爱人蓝芝是送他们突击连渡江的船工。他说：“渡江战役前我没有看见过长江，也不知道长江是啥样子，传说得很邪乎。部队刚到江边，我就去看看长江究竟啥样子？”



# 第一章

---

一个思念闪过心头：他的弟弟邵建华会不会在南岸的敌营中？11年前，邵建华奉命打入敌营至今音信皆无，妈妈让他找弟弟，可他到哪里去找？母亲的托咐一直存在心头，他自己也时刻挂念着手足之情的弟弟……

6

## 1

长江北岸，1949年2月的一个黄昏。

一匹棕色的战马在高低起伏的荒滩上奔驰，骑在马上的是我第三野战军某部渡江突击连连长邵建中。邵建中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脸上呈现出野战军战士特有的古铜色，褪色的军装处处透着战火硝烟的熏痕。一排炮弹从南岸呼啸着飞过他的头顶，落在身后的土坡上。爆炸掀起的土块纷纷从空中落下，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策马向江堤奔去。经过孟良崮、淮海大战的英雄连长，对敌人这种盲目射击的冷炮不屑一顾。而久经战场的战马似乎与主人心神相通，昂首奔腾，四个铁蹄有节奏地踢踏着被弹片犁松的泥土，自如地躲闪着地上的弹坑和被炸断的树干……

登上江堤，邵建中勒住战马，一眼望去，长江气势磅礴地展现在眼前，波涛汹涌、一泻千里、天连着水、水连着天。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得一瞬间呆住了，“好家伙！这哪是江？这简直就是

海嘛！”他回过神来，暗暗自语，脑海中堆积了无数问号：这么宽的江怎么过？这仗怎么打？心中升起由于江宽浪高而产生的畏惧。他缓缓地下马，放开缰绳，几步走到江边，凝视东去的江水，江面时而沉默，时而像被激怒了的怪物在咆哮，在怒吼。崎岖的江堤被水浪撞击着，撞击堤岸的巨浪与后浪又相撞，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这就是要横渡的长江，它包含着巨大的、无可阻挡的力量。人，在这大自然的宏伟景象前，是多么渺小。邵建中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他的思路回到现实中，一点一点地思考着……

西沉的落日透过云层将一片红色洒向江面，一时映红了江水，也映红了邵建中的身躯，他又一次抬头向南岸望去，那里烟波飘渺，只能看到江北依稀的一条灰线。突然，一个思念闪过心头：他的弟弟邵建华会不会在南岸的敌营中？11年前，邵建华奉命打入敌营至今音信全无，妈妈让他找弟弟，可他到哪里去找？母亲的托咐一直存在心头，他自己也时刻挂念着手足之情的弟弟……

长江南岸。

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向岸边，路边是透迤的铁丝网、密布的地雷区、伪装的水泥碉堡与纵深的炮兵阵地形成火力网。开车的是一位穿着美式军装的国民党中校军官，他就是打入敌后11年的共产党员邵建华，和他哥哥邵建中相比，邵建华同样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有着职业军人的英气，只是多了一份沉稳的气质，透着周旋于官场的自信和机智。沿途的哨兵举手向他敬礼，他简单地点头或挥手，一路直奔江堤。

邵建华望着涛涛东去的江水，落日的余晖被江上的波浪摇碎。他有一种大战来临的紧张，同时又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他知道，我野战军主力已进逼到北岸，从九江到江阴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即将展开空前规模的渡江战役。他坚信胜利一定是我们

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他激动的心情如大江汹涌澎湃。

邵建华默默地站在江边，下意识地想起11年前送别他的哥哥邵建中：“哥哥在哪？江北的百万大军中能有他吗？我在这里时刻盼着我们部队早日打过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震动世界的战略大决战。在142天的连续作战中，歼灭国民党183个师，154万多人，国民党的主力基本上被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为解放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宣布了包括43人的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居首位。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惨败，使国民党内部矛盾更加激化，派系斗争更为激烈。桂系第二号头目白崇禧打电报要求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在他的指使下，湖北省参议会也积极响应，致电蒋介石。大江南北，国民党里里外外一片呼唤和谈之声。蒋介石十分清楚，白崇禧的做法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想迫使他下台，推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和谈，阻止解放军过江，企图划江而治，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就在一片逼迫蒋介石和共产党和谈声中，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杜聿明兵团被歼灭了。1949年1月10日，以国民党的全部精锐部队被歼灭，结束了淮海战役。1月15日天津解放，17日塘沽解放，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蒋介石无可奈何，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李宗仁上了“台”。

有野心的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一旦自己握有权力时，就一辈子不想放弃，极力想强化自己的势力。这就等于是自己去挖自己的墓穴，而且越挖越深，蒋介石就是这样。他一刻也不想放弃统治权，有统治权总是比被统治要好。蒋介石绝对不会使自己

处在从属地位，看着李宗仁指手画脚地行使权利。所以在“引退”之前，他作了各方面的布置。首先控制军队，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他的嫡系汤恩伯为总司令。蒋介石通过汤恩伯，全面掌握苏、浙、皖三省及赣东军事指挥权，积极布置从湖口至上海的江防，把江南的军事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蒋介石还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陈诚为台湾警备司令。蒋介石在“引退”前，对军、政权利的控制已经安排就绪。

由于中共宣布了43名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一再修改，直至除夕之夜，才在争论中发表。他宣称：“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蒋介石为了安定人心，接着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有部分人员受了共产党恶意宣传，因之心里动摇，几乎失去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产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蒋介石在元旦团拜上又致辞强调：“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才能和’。”国民党中宣部发布指示：“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就是蒋介石对和谈的态度。

毛泽东早已料到蒋介石利用和谈、争取喘息时间以利再战的企图。就在这同一天，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关

闭了与国民党谈判的大门。正当毛泽东运筹渡江战役，命令解放军挺进江南时，蒋介石为了布置长江防线，拖延我军渡江，他问司徒雷登：“是否可以提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任‘调解’？”

司徒雷登没有肯定的回答。

南京外交部在1949年1月8日，将有关“调解”一事的“备忘录”，提交四国驻南京政府大使馆，均遭到各国拒绝。美国政府回答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949年1月10日、11日，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尽管斯大林的电报充满外交辞令，真实意图含糊，不难看出，斯大林是想将国民党提出的调解与和谈推给中共，再由中共提出先决条件，使国民党知难而退。这样，苏联避免了难以参入的直接调解，又使中共避免因直接拒绝和谈而承担战争责任。由于斯大林的电报是分两次发出的，毛泽东在收到1月10日的电报后，对斯大林的建议不以为然，于1月13日复电给斯大林，修正了他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苏联应明确拒绝国民党的调解建议，中共也不需要同国民党重开谈判，而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迫使国民党无条件地投降。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上述复电后，建议中共采取有条件地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迂回策略，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客气，已与以前重庆谈判时那种强迫乃至命令的口气大不相同。这表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尊重中共和毛泽东的决定。

由于1月10日电报中苏方的建议含糊不清，毛泽东一时未能完全明白斯大林的本意。当收到斯大林1月11日补充电报时，毛泽东便明白了斯大林的“良苦用心”。1月1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很高兴收到您1月11日的补充电报。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以有先决条件的迂回策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苏联于1月17日正式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调停建议，指出：“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它不认为承担照会中

所说的调解是适当的。”

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应付国民党和平谈判上，取得完全一致，开启了国共最后一次谈判。

蒋介石除夕之夜的新年《文告》发表后，翘首等待的是中共方面的反应。1月5日，蒋介石及核心人物，等来的是：新华社发出了以“战犯求和”为题的评论。这篇评论把蒋介石驳得体无完肤。

从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到1949年1月，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缺枪少炮的部队打得惨败，具有美式装备的“精锐”被解放军灭了个精光。蒋介石像个输光了的赌徒，乞求美国紧急“援助”，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这样写道：“……共军的武器装备均是美国援华。前此援华，因国民政府缺乏效能，而全部落于共军手中。若继续援助，实属进一步加强共军的力量。”

美国人愤恨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无能，而在作战部署上，又不切实执行美军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的意见，以致军事上屡战屡败，一步步走向崩溃。杜鲁门政府逐渐认为蒋介石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美国人弃蒋扶李。

蒋介石被美国人所抛弃，像做了一场恶梦，当他从恶梦中醒来时，犹如沉没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中，无力与气势蓬勃的共产党对抗。1月21日下午，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来到中山陵。当他步入灵堂时，虽然迈着镇定从容的步子，但掩盖不了他的心在颤抖、在碎裂。他在孙中山遗像前站了许久许久，他想不到22年的统治，被共产党转瞬间推翻了。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他和毛泽东的谈判，那是何等的形势？今日新华社发表的“战犯求和”的评论声中，国民党在乞求与中共和谈，这又是何等的形势？想到这里，他眉头凝结着仇恨，惨败给毛泽东他不甘心，他要做最后的挣扎，要挽回败局，可是他又无力挽回。心里是复杂的，是矛盾的，幻想着杜鲁门能伸手再拉他一把，可是杜鲁门没有拉他。

蒋介石谒陵后，黯然地登上专机，飞机在南京上空转了一圈，他望着机翼下被夕阳斜照的南京城，留在他心中的是无限悲哀。

李宗仁急于坐正，利令智昏地认为，他是按《宪法》取得的合法位置。他应该知道，《宪法》不过是一张纸，是欺骗、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段。不管《宪法》规定的是什么，总是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使。蒋介石虽然“引退”，统治权却没有放，而李宗仁所想要的正是统治权，蒋介石把他玩了个底掉，真正的权利没有给他。

“引退”后的蒋介石有自己的主张，“上台”的李宗仁有他的打算。李宗仁上台后，有三件大事迫在眉睫。其一，即宣布愿与中共和平谈判。他知道自己“资本”很薄，没有多少实力，只有主张“和谈”才有利于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只有主张“和谈”才能被舆论支持，才能制约蒋介石。因此，他撤销戡乱建国总队，把各地“戡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对于这些命令，李宗仁明明知道没有蒋介石的指令是行不通的，但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争取舆论的支持，他还是照发了。用意也是为了打击手握实权的蒋介石。其二，阻止共产党过长江，以求划江而治。这一点他和蒋介石、白崇禧是一致的。其三，乞求美援。

李宗仁这一套应付和谈的措施虽然发表，但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蒋介石对李宗仁这一套措施付之冷冷一笑，他说：“这个代总统他还当真了。”

## 2

在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总前委安排渡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及领导成员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人，召开总前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解放全国。

总前委会议对渡江作战问题讨论的意见，呈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报。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我们于丑佳（2月9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负责同志均参加，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

（一）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有些准备工作（如雨具、纱布等）即再推一个月，亦难办到。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属有利，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

（二）关于战役部署。依现态势，及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具体准备情况，确定以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第二野战军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第三野战军之四个兵团，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第二野战军一个兵团，则任安庆东西段。第二野战军另两个兵团，除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做总预备队，以便紧随首先突破的部队之



后，待机渡江钳制。而我们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突破江防之后的作战，则视当时情况决定。

(三) 关于开进。第三野战军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当在宿松东西地区，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个兵团则于3月半移动，以半月形成到达江边。第二野战军各部，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旬，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

(四) 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逼近江边了解情况，并作准备。

(五) 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宋任穷、曾希圣等，应即到职，使用(有)所依托。否则，江淮、皖西不能统一，妨害极大。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前曾数次电报，究应如何，恳早示复。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究应如何，请早示复。

(中略)

(七) 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集，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除华东外，我们的意见是，中原局亦应预以豫、皖、苏及鄂、豫力量支持第二野战军一个时期，直到过江为止。

(八) 为保障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行动，建议第四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九) 以上八项，均带有时间性，请考虑电复示。

刘、陈、邓、粟、谭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诸问题给第二野战军、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并告平津前线总前委电。

刘、陈、邓，饶、康、曾、粟、谭并告林彪、聂荣臻：